

# 1930 年代新教育的理想與困境

劉茉莉

摘要：新文化運動之後，中國的教育文化發生了許多本質上的轉變，民主與科學被輸入這古老國度的教育機制中，從根本上影響着教育文化的發展。但是這種發展依然面對着巨大的阻力與消極影響。仔細閱讀幾位當時與教育密切相關的作家老舍、魯迅、葉聖陶等人的文本，可以分析出 1930 年代前後新教育發展的困境，當然在困境中也能更加清晰地辨認出人們對於新教育的理想。

關鍵詞：新文化運動 新教育 傳統教育

新文化運動之後，中國的教育文化發生了許多本質上的轉變，民主與科學被輸入這古老國度的教育機制中，從根本上影響着教育文化的發展。從教育目標、教育制度、教學內容到教學方法都呈現出新的氣象，變革的氣息是此時教育文化最大的特征，然而這或許只是教育文化積極的一面；如果仔細審視當時的一些個體經歷以及作家文本，能觀察到當時教育文化的一些真實的困境，那同樣是不該忽視的另一面。

新教育從清末起步至辛亥革命前已經有了一定的發展，到 1912 年民國建立之後有了法律法規的保障更是突飛猛進地在全國各地開展起來，對於傳統的教育理念、教育模式都有極大地沖擊，民國之後社會發展所依賴的人員力量很多就來自於新教育的培養。但 1920 年代回顧新教育，人們發現許多問題，舒新城曾指出：“數十年來的新教育，第一，不能得各種事業的輔助而無由發展；第二，現在所有的新教

育只是一點外國的形式，根本不適合中國社會的需要；第三，新教育對於中國固有文化、未來事業，並不曾有所發揚、創造。”<sup>1</sup>實際上仔細閱讀當年一些有教育工作背景的文學家的作品，也會發現大量關於新教育的內容：在新教育突飛猛進貌似一路凱歌的盛況下，亦掩蓋了大量矛盾、沖突、拉鋸的過程，傳統教育思想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更何況此時的傳統教育尚有極大的生存土壤，與新教育之博弈、鬥爭在當年的文學作品中保留了鮮活的面貌。

1918年，十九歲的老舍從師範學校畢業分配到方家胡同小學當校長，在小學工作兩年後，1920年老舍被提升為北郊勸學員。“二十年代初，北京按教育行政區域劃分為八區，城外四區各設一名勸學員。北郊勸學員的管轄地段包括德勝門、安定門、東直門、朝陽門郊外的四大片。老舍的管理對象是散布在這四大片地面上的小學和私塾。他同時還兼着兩個職務：教育部京師通俗教育研究會會員、公立北郊通俗教育講演所所長。”<sup>2</sup>由於家庭貧困，老舍需要盡早參加工作賺錢養家，1919年的“五四”運動時期他已經是小學校長。但1915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以及更早已經在全國範圍展開的教育改革在老舍求學的過程中產生了長遠的影響。當上勸學員以後，老舍第一件事就是“申請解散十七個私塾；二是請求支持北郊馬甸清真教在村內辦一個公立國民學校”，這兩件事都在官方批准下順利完成，但是當他“請求學務局和地方行政出面維持被奸商破壞的東鎮國民學校”時，這個想法並沒有得到支持，老舍從中看到了官商勾結的黑幕，也了解到了在表面上推動新學推動新文化的背後，官商根本利益不會被觸動，他們只會在不觸及自身利益的情況下做

---

<sup>1</sup>朱慶葆：《教育的變革與發展》（《中華民國專題史》第十卷），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8頁。

<sup>2</sup>舒乙：《老舍正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頁。

些教育改革的工作。這件事情對老舍的打擊很大，此後幾年的時間裏老舍相當消極，直到離開北京到天津南開中學當老師，回北京為北京地方服務團工作，老舍舍棄了較高的職位與薪水，選擇安貧守困尋找新的出路。

當勸學員的這段經歷成為了老舍第一部小說《老張的哲學》的重要素材，“書中的老張就是被老舍解散了的十七個私塾的塾師們的化身，孫八就是和老舍勢不兩立的土豪劣紳們的化身，學務大人就是昏庸腐朽的上司們的化身。”<sup>3</sup>書中詳細描述老張的“學堂”使人如身臨其境，正是老舍自己生活中所積累的經驗：

北房三間打通了隔斷，足以容五十多個學生，土砌的橫三豎八的二十四張書桌，不用青灰，專憑墨染，是又黑又勻。書桌之間擺着洋槐木作的小矮腳凳：高身量的學生，蹲着比坐着舒服；小的學生坐着和吊着差不多。北牆上中間懸着一張孔子像，兩旁配着彩印的日俄交戰圖。西牆上兩個大鐵帽釘子掛着一塊二尺見方的黑板；釘子上掛着老張的軍帽和陰陽合歷的憲書。<sup>4</sup>

老張生性吝嗇狡詐，只把開學堂當做壓榨學生的一盤生意，通知他新學務大人要來檢查時，他以最快的速度“整理校務”：

自己冷靜了幾秒鐘，把腦中幾十年的經驗匆匆地讀了一遍，然後三步改作兩步跑進北屋。“小三！去叫妳師娘預備一盆茶，放在杏樹底下！快！小四！去請妳爹，說學務大人就

來，請他過來陪陪。叫他換上新鞋，聽見沒有？”小三，小四一溜煙似的跑出屋外。“你們把《三字經》，《百家姓》收起來，拿出《國文》，快！”

“《中庸》呢？”

---

<sup>3</sup>舒乙：《老舍正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頁。

<sup>4</sup>老舍：《老張的哲學》，上海：文匯出版社，2008年版，第2頁。

“費話！舊書全收！快！”這時老張的一雙小豬眼睜得確比豬眼大多了。

“今天把《國文》忘了帶來，老師！”

“該死！不是東西！不到要命的時候妳不忘！《修身》也成！”

“《算術》成不成？”

“成！有新書的就是我爸爸！”老張似乎有些急了的样子。“王德！去拿掃帚把杏樹底下的葉子都掃幹淨！李應！妳是好孩子，拿條濕手巾把這群墨猴的臉全擦一把！”<sup>5</sup>

這一段出現在小說第一章的情節用非常簡練生動的筆墨把當時許多陽奉陰違的私塾、學堂的狀況描述得清清楚楚。他們平時依然按照老規矩讀着早應廢棄的舊書做課本，民國初年已由教育部推動的新教育理念，教育宗旨，以及課程標準在下面的學堂裏並沒有得到真正的貫徹，像老張這樣打着新教育辦學堂，實際上坑蒙拐騙的人恐怕也大有人在。老舍雖然打報告取消了十七所私塾，但新辦的學堂又是否可以真正貫徹新教育呢？在老舍離開京郊勸學員的位置後，代替他的勸學員能以認真負責的態度貫徹對新教育的堅持嗎？分布在全國各地的私塾、學堂又是怎樣的情況呢？當然不能說所有的私塾、學堂都一味承續舊教育，對新的教育理念、教育宗旨與課程標準置若罔聞，但新舊參雜，應付檢查就多教教新科目，平日老先生們還是更熟悉舊書舊知識也是可以理解的。社會動蕩期，教育新舊轉型，也成為生意人眼中的肥肉則又是在老舍小說中反映出來的另一個問題。

從教育部推出新的教育理念、課程標準到全國大範圍的接受實施，其關鍵並不在於內容或者課本，關鍵在於授課的人。師範類院校培養出來的新老師們走上講壇，分布到全國各地中小學才是新教育真正的開始。但是社會傳統文化的力量依然

---

<sup>5</sup>老舍：《老張的哲學》，上海：文匯出版社，2008年版，第6頁。

非常強大，懷抱新思想、有著理想主義追求的年輕教員們還將在校園裏、在生活裏面對諸多挑戰，新教育的征程依然相當艱難，在魯迅的小說以及葉聖陶的小說裏會清晰地呈現出來。

1909年8月間，魯迅回國，在浙江兩級師範學堂做生理學和化學教員。當時的同事夏丏尊的《魯迅翁雜憶》一文說到：“周先生擔任生物學科方面的翻譯。此外，他還兼任着幾點鐘的生理衛生的教課。”<sup>6</sup>1910年9月，魯迅又應紹興府中學堂的聘請，去教生物學兼任監學。辛亥革命後，紹興軍政分府任命魯迅為紹興初級師範學校校長。在民國成立之前，日本留學歸國的魯迅一直在學堂工作，接觸的人、事亦都與教育關係較多，魯迅對辛亥革命之前浙江一帶的基礎教育是相當了解的。民國成立，1912年5月魯迅開始到教育部上班，被任命為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主管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等事項。8月，又被任命為教育部僉事，同時還要他參加通俗教育研究會，擔任小說股主任。魯迅曾經在日記裏記載自己的一些工作：例如，他曾到天津去考察新劇，曾去選擇開辟公園的地址，曾去視察國子監及學宮的古文物，曾主持籌備全國兒童藝術展覽會，曾參與籌建圖書館的工作。<sup>7</sup>事實上，不管是早期在基礎教育中學工作，還是在當年的民國教育部工作，又或者日後輾轉國內各大學任教職，魯迅一生與教育有着很深的關係，他對教育的關注對教育的反思也呈現在小說創作中。

收入《彷徨》集子的《在酒樓上》創作於1924年2月，正是新文化運動落潮時期，此時的魯迅拿起筆反思社會革命的情況，描述封建思想復辟的情形。文中以第一人稱“我”為敘述視角，回到故鄉在酒樓上見到舊同窗、舊同事呂緯甫，小說

---

<sup>6</sup>朱正：《魯迅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87頁。

<sup>7</sup>朱正：《魯迅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97頁。

的主要內容是兩位在故鄉不期而遇的故人的談話，同時通過“我”的詢問、質疑、震驚、遺憾等感受傳遞出呂緯甫這樣一位理想主義者在生活中迷失、消沉的狀況。

呂緯甫本是與敘述者同樣接受了新式教育，在新學堂當過教員，有過理想追求的年輕人，可是在酒樓上的他頹廢、消沉，說自己教學生“子曰詩云”：

“就是。這些無聊的事算什麼？只要模模糊糊。模模糊糊地過了新年，仍舊教我的‘子曰詩云’去。”

“妳教的是‘子曰詩雲’麼？”我覺得奇異，便問。

“自然。妳還以為教的是 ABCD 麼？我先是兩個學生，一個讀《詩經》，一個讀《孟子》。新近又添了一個，女的，讀《女兒經》。連算學也不教，不是我不教，他們不要教。”

“我實在料不到妳倒去教這類的書，……”

“他們的老子要他們讀這些；我是別人，無乎不可的。這些無聊的事算什麼？只要隨隨便便，……”<sup>8</sup>

經歷過從晚清到民初的各種變革、文化運動，一位曾經有着理想主義追求接受過新教育在新學堂工作過的年輕人，卻在教自己的學生讀《詩經》、《孟子》，甚至《女兒經》，以此“子曰詩云”賺着“不大夠敷衍”一個月生活的二十元。

小說中呂緯甫有一個對自己這些年生活的比喻：

“我一回來，就想到我可笑。”他一手擎着煙卷，一只手扶着酒杯，似笑非笑的向我說。“我在少年時，看見蜂子或蠅子停在一個地方，給什麼來一嚇，即刻飛去了，但是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便以為這實在很可笑，也可憐。可不料現在我自己也飛回來了，不過繞了一點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來了。你

---

<sup>8</sup>魯迅：《魯迅小說全集》（1），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頁。

不能飛得更遠些麼？<sup>9</sup>

在這個比喻中，不僅呂緯甫，包括敘述者我都如同被嚇得飛出去的蒼蠅，不過是繞了一點小圈子就回到原地了。顯然這是魯迅對新文化運動落潮的一種失望之情。實際上在加入“文學革命”之前魯迅也是相對悲觀頹唐的：“然而我那時對於“文學革命”，其實並沒有怎樣的熱情。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sup>10</sup>在魯迅的眼中一次又一次的革命似乎都回到了原點，創作《在酒樓上》是 1924 年，此時新文化運動落潮，魯迅在小說中寫到依然在教授《孟子》《女兒經》等“子曰詩云”的內容，顯然又是一次失望的過程。小說最後寫呂緯甫“他滿臉已經通紅，似乎很有些醉，但眼光卻又消沉下去了。”<sup>11</sup>呂緯甫雖然在舊同窗那裏似乎看到了自己原來的理想主義，產生了失落也激起了一些悵惘，但最終眼光還是消沉了。回到原點的蒼蠅並不知道自己其實並未飛遠，小說中呂緯甫的內心也非常清楚，自己以及舊時同窗也並未在當年追求理想主義的道路中走多遠，不過是出去轉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當初一心追求的新教育在生活生計面前，被“子曰詩云”以及《女兒經》所替代。

從戊戌維新開始，到五四運動，對傳統教育的批判日益激烈。早就在教育領域工作，關心教育的魯迅並非新文化運動之後才開始這方面的工作，1913 年他集中翻譯了日本心理學家上野陽一的《藝術玩賞之教育》、《社會教育與趣味》、《兒童之好奇心》，1914 年又翻譯高島平三郎的《兒童觀念界之研究》，足見魯迅對教育問

---

<sup>9</sup>魯迅：《魯迅小說全集》（1），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 年版，第 137 頁。

<sup>10</sup>魯迅：《魯迅小說全集》（1），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 年版，第 363 頁。

<sup>11</sup>魯迅：《魯迅小說全集》（1），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 年版，第 139 頁。

題的看重，正是這時期的翻譯使魯迅學習到了“兒童”的概念：“往昔的歐人對於孩子的誤解，是以為成人的預備；中國人的誤解是以為縮小的成人。直到近來，經過許多學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與成人截然不同。”<sup>12</sup>也為日後魯迅提出“救救孩子”做了理論準備。

魯迅的文學創作方面也不僅在這部小說寫到當時新教育的實際狀況，在《狂人日記》中將舊教育比作“吃人”，塑造孔乙己這個典型人物傳遞對舊教育的控訴，在 1919 年寫的《隨感錄》中寫到“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聲光化電’，下午‘子曰詩云’”。<sup>13</sup>同一時期，陳獨秀也談到“我們中國，模仿西洋創辦學校，已經數十年，而成效毫無。……所教的非是中國腐舊的經史文學，就是死讀幾本外國文和理科教科書。……不過把學校畢業當作出身地位，這與從前科舉有何區別呢？”<sup>14</sup>人們往往過於偏重於對新式教育發展的關注，而忽視了在中國上千年的教育傳統有多麼大的慣性。在廣大的城市、城鎮和鄉村有多少大大小小的私塾，使用的都是“三百千千”的啟蒙小四書《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以及《論語》《孝經》之類的傳統蒙學教材。據資料統計，南京有私塾五六百所，廣州有一千多所，全國加起來一萬多所，遍布鄉間的蒙塾數不勝數。當時也有大量的讀書人家會讓子弟先在家塾啟蒙再去新式學堂，或者平日在新式學堂，回家仍有傳統文言補習。這種新舊並存的現象是應該辯證看待的。一方面是新生的教育力量遠遠不夠，傳統教育慣性強大，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則是如果這種新舊並行是有可以更好發揮作用的空間的話，如果是以新教育為最終目的，以傳統教育啟蒙保留傳統文

---

<sup>12</sup>魯迅：《魯迅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40 頁。

<sup>13</sup>魯迅：《隨感錄（54）》，《新青年》，1919 年第 6 期，第 3 頁。

<sup>14</sup>陳獨秀：《今日教育之方針》，《青年雜誌》，1915 年第 1 期，第 2 頁。

話精神，完全可以在新舊承續之間發展得更好，但在魯迅與老舍的觀察與文字裏，這些所謂的私塾甚至新學堂，不僅沒有真正承續傳統的精髓，而是延續了糟粕，這才是此時教育最需要思考的問題。

另一位用樸素的文學筆法把民國時代新教育的發展與困境、年輕人對新教育的努力與無助全面呈現出來的是葉聖陶的《倪煥之》，這是“一部現實而深刻的中國現代教育史資料”<sup>15</sup>。《倪煥之》的作者葉聖陶從1911年當小學教師，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創作這部小說，有十幾年教育工作的經驗，他“對當時教育界的各個方面和各種內部情形，特別是對小學教育，相當熟悉，對於流行於當時的‘外來的教育理論同方法’，不但從書本上學習過，而且曾‘拿來施行’，企圖影響那些‘不知振作的同業’”<sup>16</sup>。這種生活經驗以及這種用教育理論教育方法指導實際工作的經歷正是小說裏倪煥之以及蔣冰如所面對的情形。當然也試圖突破教育的圈子，以教育的問題反映更大的社會，以教員的工作變動呈現更多的生活場景，以年輕人的生活軌跡表現理想主義者的失落。小說主要內容分為三個部分：第一章、第二章用倒敘法講述辛亥革命後的教育情況，視點集中在上海、南京附近的中等城市；第二部分是小說的主體，從第四章至第二十一章都是反映五四運動前後的教育情況，以鄉鎮學校為主要地點；第三部分作者試圖展現更廣闊的世界，場景轉到大革命的中心城市上海，所描寫的也不僅僅是教育，而是整個社會的革命情況了。從小說藝術的角度來討論的話，《倪煥之》這部小說有各種問題，比如語言過於樸素平實，小說的藝術化追求也不算太高，而對於這些，葉聖陶都是非常清楚的：“我似乎沒有寫什麼自己不怎麼清楚的事情。換句話說，空想的東西我寫不來，倒不是硬要戒絕

---

<sup>15</sup>劉增人、馮光廉：《葉聖陶研究資料》，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第498頁。

<sup>16</sup>劉增人、馮光廉：《葉聖陶研究資料》，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第501頁。

空想。我在城市裏住，我在鄉鎮裏住，看見一些事情，我就寫那些。我當教師，接觸一些教育界的情形，我就寫那些。中國革命逐漸發展，我粗淺的見到一些，我就寫那些。”<sup>17</sup>

在葉聖陶的敘述中可以看到，包括葉聖陶在內的當時很多走上教育崗位的年輕人是理想主義追求的，儘管這追求一開始是模糊的：“他也相信教職為的換飯吃，但是除了吃飯還該有點別的；要是單為吃飯，就該老實去謀充厘卡司員，不該任學校教師。”<sup>18</sup>《倪煥之》裏校長蔣冰如當然也是懷着一顆理想主義的心迎接倪煥之的，對舊同事沒有熱誠沒有理想的狀況他也一直希望有所扭轉：“他想他們只是沒有嘗到教育事業的真味罷了；一旦嘗到了這人世間至高無上的真味，那就硬教她們淡漠也決不肯了。”懷抱着理想主義熱誠的人們走到一起，希望在學校裏開創一番事業，最後卻無奈地在社會環境的擠壓，在家庭生活的困頓中喪失了“這人世間至高無上的真味”，倪煥之雖然還在掙扎，還跑到上海參加革命尋求新的出路，最終卻病亡，理想主義的教育者的出路在哪裏？小說最後以佩璋的覺醒來結束，“為自己，為社會，為家庭，我都應該做點事。”但覺醒之後的路在哪裏呢？真的有可以走得通的路嗎？小說只給了覺醒的信號與不太清晰的方向，此時的葉聖陶也在探索與思考中。

從 1902 年“壬寅—癸卯學制”到 1912 年民國教育宗旨，從清末戊戌維新到新文化運動，教育在往“現代性”前進的路途中，民主、科學、平等時代需要日漸清晰，然而在這幾十年的發展中，教育並沒有得到穩定的發展環境，從晚清各地起義到民國建立，從袁世凱時期的南北對峙，到多年的軍閥混戰，即使再有心發展教

---

<sup>17</sup>劉增人、馮光廉：《葉聖陶研究資料》，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8 年，501 頁。

<sup>18</sup>葉聖陶：《倪煥之》，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0 年版，第 82 頁。

育的統治當局亦為局勢所迫，忙於戰亂，任鴻雋也曾批評民國政府教育經費占國家收入太少，與一躍千丈的軍費相比望塵莫及<sup>19</sup>。同樣，在小說家的筆下，1920 年代的教育非但沒有發展到人們預期的模樣，相反深陷各種問題與泥沼。當然，苛求小說家解決社會問題是不合理的，葉聖陶的《倪煥之》有價值的地方更多的體現在這是中國現代教育史的資料，是活生生的現代教育經驗的呈現，小說借樹伯、蔣冰如、倪煥之等人的人生道路描述了二十年間整個中國社會教育的各種變革，人們的選擇、困惑與突破，因長期身處其中，更是一針見血地為中國現代教育作出了診斷：“一句話：有的是學校，少的是教育。教育是一件事情，必得由人去辦。辦教育的人當然是教員。教育界的黑暗就在於教員！多數的教員只是吃教育飯，旁的不管；兒童需求於他們的是什麼，他們從來不曾想過。”<sup>20</sup>1933 年，吳稚暉曾經在《教育與民眾》雜誌上沉痛的詰問：“試問這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直到現在四十年，救國的教育，還未實現，這是什麼原故？新教育實施的效果，究竟在什麼地方？我個人總是這樣想：我們的新教育是走錯了途徑：我們教育還是蹈了過去古典式八股式教育底覆轍，所以四十年來所得的是這麼樣的結果！”<sup>21</sup>以教育為立國之根本，為救國的根本事業是當年知識分子們的一致追求，可是經歷幾十年變革與改良的新教育所暴露的問題也是不應被忽略的。

---

<sup>19</sup>任鴻雋，〈甚麼是救國教育〉，《大公報》，1934 年 10 月 28 日。“從民國以來，政府對於教育並未十分重視，這可以拿教育經費和國家歲入的比例來做個說明。民國五年全國歲入的預算為四萬七千壹百余萬元，教育經費為壹千二百六十余萬元，約國歲入百分之二零六。本年政府發表歲入的預算為七萬七千七百余萬元，教育經費為壹千九百余萬元，約國歲入百分之二零五（此數最近略有變更）。教育經費所占國家收入成數之小，與歷年來的些少增加，和軍費的壹躍千丈相比較，真有望塵莫及之感。”

<sup>20</sup>葉聖陶：《倪煥之》，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0 年版，第 82 頁。

<sup>21</sup>吳稚暉：《教育改造與救國》，《教育與民眾》，1933 年第 6 期，第 4 頁。

從數據上，從資料上人們可以輕鬆地算出新文化運動之後全國新學校的數量，師範類院校培養的新教員的數量，因為國家政策在師範類院校方面的傾斜與補助，大量的年輕人走上了教員的道路。可是在葉聖陶看來，這遠遠不夠，教育的核心最重要回到“人”：受教育者與教育者，掌握教育的質量的是教育者，正如小說所討論的教師這個崗位不僅僅有技術要求，在技術要求之外還需要真誠與熱誠，需要理想主義的情懷與堅定的追求，這些才是一個社會教育發展起來的核心力量，也是葉聖陶在《倪煥之》裏真正呼籲的，呼籲一個保護教育者熱誠、保障教育者理想主義追求的社會環境。

